

劳动力成本提高下的贸易结构转换

赵 勇

摘要：本文主要就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和贸易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分析的结论表明，从我国出口的外部需求基础、贸易互补性优势、单位劳动成本的国际比较以及我国内部劳动力成本的区域差异来看，虽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某一行业的比较优势，但不会从根本上限制我国制成品贸易的发展空间。同时，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主要来源于市场力量，那么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出口集中度较小的产业在总的对外贸易出口中的比重将有所增加。这一点，突出的反映在纺织和服装制造业等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机械设备和电器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行业上。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国在纺织和服装制造业等行业上的比较优势将受到较大影响，而机械设备和电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比较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同时，从我国出口的地区结构看，伴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美国、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高端产品出口地位将得到强化和巩固，印度则成为我国潜在的市场出口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未来政策取向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侧重：一是强调市场机制的完善；二是审慎地、有步骤、有规划地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的梯度转移；三是在稳固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印度市场。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 贸易竞争力 贸易结构

一、引言

从 2004 年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工短缺现象。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不仅未能从根本上得以缓解，甚至还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部地区蔓延的趋势。与此相对应，在我国的民工荒反复出现的同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呈现不断上升之势，突出地反映在劳动报酬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幅提高上。在 1991-2009 年期间，我国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高达 14.7%，而最低工资标准也不断大幅上调。2010 年，在青海宣布于 9 月 1 日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我国已有 27 个省市陆续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且调整幅度大多在 10% 以上。

伴随着我国劳工短缺现象的出现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对中国二元经济“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也开始不断出现。从结论上看，虽然不同的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是否出现

还存有较大的分歧 (Garnaut 和 Huang, 2006; 蔡昉, 2007, 2008, 2010; 姚洋和余森杰, 2009), 但从长期来看, 伴随着我国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进一步需求, 我国劳动力成本的长期上涨将不可避免。应该说, 我国劳动力特别是中低端劳动力的收入上涨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有利于缩小我国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但问题在于, 长期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外部需求水平的稳定增加, 而外部需求的增长动力则是建立在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基础之上的。因此, 伴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 我国贸易竞争力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不再对“刘易斯拐点”的是否出现进行探讨, 而是重点分析当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我国贸易竞争力和未来贸易发展空间的影响。我们认为, 如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市场力量自然作用结果的话, 那么劳动力成本变动传递的其实是劳动力要素市场供求变动的价格信号, 其必然会引起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就是说, 由于不同产业的产业特性不同, 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导致的资源重新配置必然会引起产业结构继而贸易结构的变动。从这个意义上说, 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我国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不仅仅是总量问题, 更重要的是一个结构问题。相应地, 相对于单从总量上考察劳动力成本变化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 通过区分不同行业的产业特性, 来就劳动力成本上涨对贸易结构的影响进行探讨更加具有理论和现实价值。

本文其余部分共分为三个章节。第二部分重点从外部需求基础和内部现实条件两个方面来对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下的贸易发展空间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 我们在第三部分, 采用跨国面板数据, 对劳动力成本上涨对贸易结构的影响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最后一部分是结论部分。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

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供给短缺的趋势, 更多的是增量意义。在总量层面来看, 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局面仍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得以保持 (蔡昉, 2007)。更为重要的是, 从以下的几个因素来看, 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没有较大改变的背景下, 考虑到中国外贸发展的外部需求基础和内部现实动力, 中国的外贸发展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一) 中国外贸发展的外部需求基础

从一国出口增长的源泉来看, 外部需求和内部供给是外贸增长的两个主要动力 (章艳红, 2009)。而在当前我国出口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仍然较大的背景下, 外部需求的高低直接

决定了我国未来贸易空间的大小。鉴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以及中国出口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在此通过对美国内外需求结构的考察来对中国外贸未来发展的需求基础进行分析。

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在美国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在 60%以上，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持续增加，并在 2001 年首次超过 70%。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波动，但在 2010 年第 2 季度，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高达 70.4%。¹同时，进一步考察 1947-2010 年美国居民消费内部消费结构的变动情况（图 1），我们还可以看出，在国民经济增长中，耐用品消费所占比例的波动幅度不大，一直保持在 9%左右的水平上。而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非耐用品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由 1950 年第一季度的 29.6%下降到了 2010 年第二季度的 15.8%，而服务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由 1950 年初的 26.2%上升到了 2010 年初的 47.4%。但应该注意到的是，在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动的同时，在生产领域，美国生产结构的变动方向却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呈现出明显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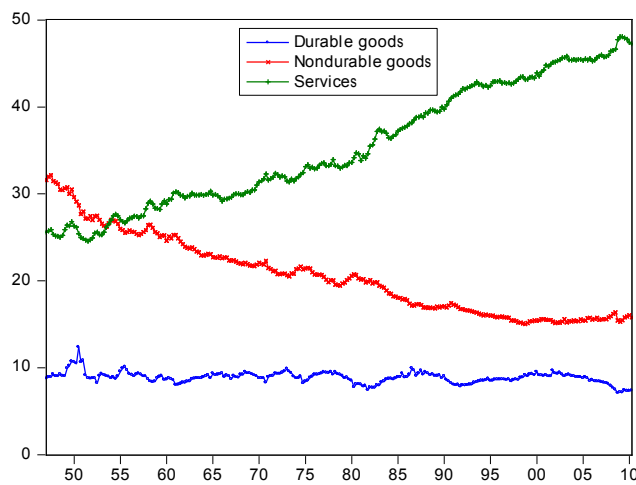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的国内消费结构（1947-2010）

¹ 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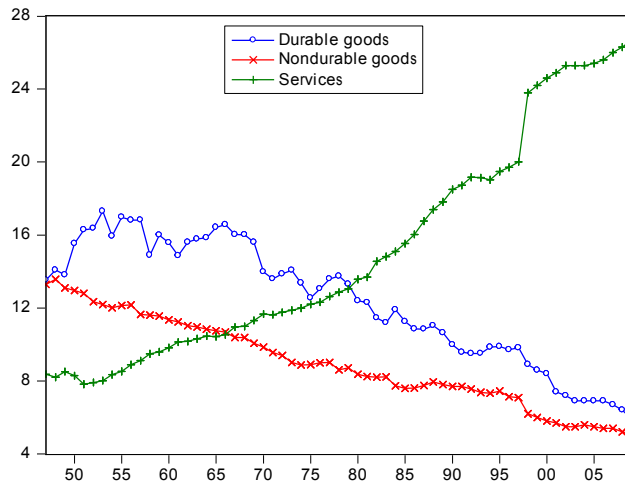


图 2 美国的国内生产结构（1947-2009）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图 2 作出的是美国国内不同产业的生产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图。具体来说，就耐用品而言，与居民消费比重中的相对平稳不同，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耐用品的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在 1965 年，美国耐用品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6.4%，之后逐渐下降，并在 1990 年首次下降到 10% 以下，而到了 2009 年，这一比重尚不足 6%。而就非耐用品制造业而言，与耐用品相类似，其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呈逐渐下降之势，只是下降的速度略有降低而已。但尽管如此，与上世纪 50 年代相比，非耐用品行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下降了一半有余，从 1950 年的 13.0% 下降到了 2009 年的 5.1%。而与产品生产部门不同，美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呈逐渐上升之势，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上世纪 50 年代初的不足 10% 持续增加到了 2009 年的 26.7%，呈现出与美国居民服务消费相一致的变化趋势。

通过比较美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和企业生产结构，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的脱钩趋势日益明显。也就是说，虽然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特征进一步强化，但从消费和产出的缺口来看，伴随着制造业的逐渐萎缩，美国居民消费特别是耐用品居民消费的缺口却成持续扩大之势。而在开放的背景下，这样的一种产出缺口只能通过进口需求来加以满足。相应地，在美国居民消费中，对进口产品的消费特别是对进口耐用品的消费比例在逐渐增加。

从图 3 可以看出，伴随着美国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脱节，美国居民消费中进口产品所占的比重呈现出稳定上升之势。进口消费产品占总消费的比重从 1989 年的 7.12% 逐渐上升

到了 2008 年的 14.2%。2009 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居民消费的进口需求有所降低，但进口消费品所占比重仍然高达 13.2%。而这一点，在耐用品进口消费上反映的尤为明显。在 1989-2009 年间，美国居民耐用品消费中，进口产品的比例增加了整整一倍，由 10%上升到了 20%。而进一步分析美国消费品进口的国别构成，我们发现美国从中国消费品进口的增长成为美国进口需求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从图 4 可以看出，在 1989 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占总进口的比重尚不到 10%，之后持续增加，并在 1994 年首次超过 20%。虽然在上世纪 90 年代这一比重增加缓慢，非耐用品进口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进入新世纪后，美国从中国消费品的进口比重迅速增加，到 2009 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比重分别达到了 48.8%和 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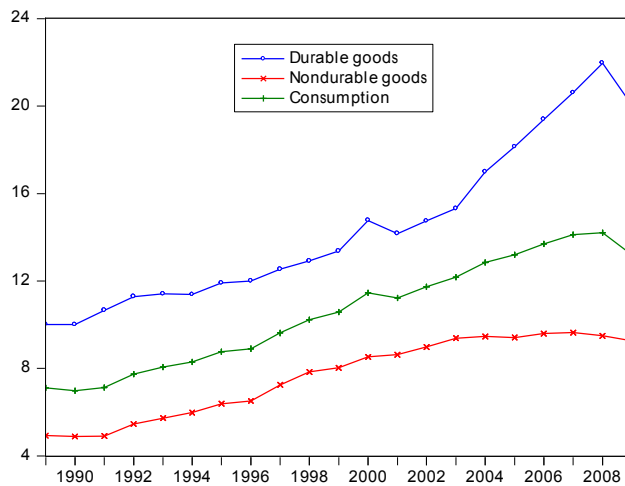


图 3 美国居民消费中进口产品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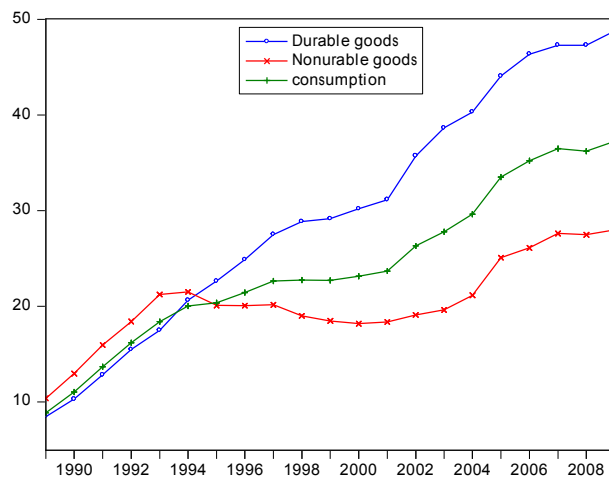


图 4 美国从中国进口消费品在进口消费中的比重

注：1989-2008 年数据及进口消费产品的分类均来源于章艳红（2009），2009 年数据来源于美国 USITC 数据库。

（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互补性优势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鉴于居民消费需求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美国工业产品在消费和生产结构上的长期脱节，在中短期内，美国居民消费对进口商品大量需求的局面将不会有所根本改变，而这构成了中国未来外贸出口的外部需求基础。但问题在于，美国居民进口需求的增加对应的是外围国家整体的发展空间，而整体发展契机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个体机会分配的公平，更不必然意味着潜在发展机会向现实利益的自然实现，能否充分利用这样的一种发展机遇仍然取决于外围国家的经济条件特别是贸易发展状况。而这其中，双边贸易的互补性与否至关重要。

在贸易规模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贸易利益的大小与贸易的商品结构有关。当两国建立在彼此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出口供给与进口需求相吻合时，两国的贸易互补性较高，双方贸易的展开在给两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多收益的同时，也为今后双边贸易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动力。为了分析中国在对美国出口中的贸易互补性程度，我们从时间序列和截面空间两个维度，对 2000-2009 年中国对美出口的互补性指数进行考察的同时，也对 2009 年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见表 1。

表 1 2009 年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国家	时间	初级产品					劳动密集型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		
		食品 和活 动物	饲料 和烟 草	非食 用原 料	矿物燃料、 润滑油和 相关原料	动植物 油脂及 腊	按原料 分类的 制成品	杂项 制品	化学和 相关产 品	机械和 运输设 备	未分 类的 商品
中国	2000	0.54	0.31	0.31	0.34	0.06	1.00	3.71	0.33	0.87	0.09
	2001	0.49	0.33	0.28	0.37	0.05	0.95	3.47	0.34	0.93	0.13
	2002	0.47	0.31	0.24	0.32	0.02	0.95	3.37	0.30	1.02	0.11
	2003	0.43	0.26	0.19	0.33	0.02	0.91	3.20	0.30	1.12	0.09
	2004	0.37	0.24	0.16	0.31	0.02	1.01	3.01	0.28	1.18	0.07
	2005	0.35	0.20	0.15	0.25	0.04	1.04	2.95	0.30	1.21	0.08
	2006	0.36	0.18	0.11	0.25	0.05	1.16	2.83	0.30	1.20	0.05
	2007	0.64	0.22	0.40	1.35	0.49	0.73	1.85	1.03	1.30	0.95
	2008	0.63	0.20	0.39	1.34	0.51	0.77	1.84	1.02	1.30	0.86
	2009	0.34	0.20	0.07	0.17	0.04	0.34	0.98	1.42	2.79	0.03
德国	2009	0.56	1.22	0.16	0.21	0.27	1.02	0.82	1.29	1.18	1.65
巴西	2009	2.91	2.94	2.28	0.92	1.33	0.46	0.82	0.50	0.32	0.59
印度	2009	0.84	0.81	0.58	1.39	0.47	0.70	1.58	0.44	2.03	0.96
马来西亚	2009	0.36	0.64	0.24	1.51	11.05	0.40	0.57	1.35	1.05	0.18

墨西哥	2009	0.69	1.25	0.15	1.36	0.07	0.29	0.48	1.57	1.16	0.50
韩国	2009	0.11	0.33	0.11	0.67	0.01	0.69	0.85	1.64	1.14	0.17
日本	2008	0.05	0.10	0.13	0.25	0.02	0.59	0.80	1.79	0.79	1.15

注：以上产品是按国际贸易标准（SITC）第四版分类原则进行分类，贸易互补性指数以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对美国的出口进行计算，具体的计算方法参见于津平（2003）。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UNCOMTRADE）的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 1 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互补性在不同的产业间差异明显，在初级产品上与美国贸易互补性最强的国家主要包括巴西、印度和墨西哥；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与美国贸易互补性强的国家主要包括中国、德国和印度；而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与美国贸易互补性强的国家主要包括中国、德国和日本。

具体分析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互补性，发现 2009 年中国与美国贸易互补性较强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杂项制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上。而从这些产品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在这些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这一点，在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上反映的尤为明显。这说明中美两国在这些产业上蕴含着较大的贸易利益，而这既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美国进口消费品中中国元素持续增加的内在原因，也为今后中美两国贸易的持续扩大奠定了现实基础。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在 2000-2009 年间，中国同美国的互补性结构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具体来说，在 2006 年之前，中国同美国的贸易互补性主要体现在杂项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在 2000 年之后，以机械和运输设备上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互补性逐渐增加，由 2000 年的 0.87 逐渐上升到了 2009 年的 2.79，与之相对应，中美两国在机械和运输设备上的贸易规模也在迅速的增加。2000 年中国对美出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总额为 183 亿美元，仅占当年美国第一进口国——日本出口额的 16.7%。2003 年，中国在此产品上的对美出口额为 429 亿美元，成为美国此类产品的第五大进口国。而到了 2007 年，中国成功超越墨西哥，成为当年美国的第一进口国。假若这一发展趋势能够加以维持的话，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的对美出口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事实上，中国在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对美国出口地位的形成有其必然性，这是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有优势密不可分的。20 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主动进行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纷纷将传统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而中国则成为了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究其缘由，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有优势密不可分的。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不但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为制造业产品的销售提供了一个广阔的

消费市场，这构成了制造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同时，大国经济所独有的对制造业产业的前向及后向支持能力为制造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配套能力，这既有利于吸引制造业产业的移入，同时制造业的发展也会带动相关配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增强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最为重要的是，以直接投资为主要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具有很强的地理集聚的特点，即直接投资向少数国家和地区或者一国内部某一地区集中流入。这种某一产业的地理集聚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技术外溢、信息共享等多种渠道来降低成本，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且这种地理集聚优势一旦形成，便极易与新来投资产生互动效应，很难被模仿和复制。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吸引直接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已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企业集群，地理集聚优势明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中短期内，我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很难被其他国家动摇，中美两国在制造业领域的贸易往来也将会愈加密切。

（三）从单位劳动成本的跨国比较看中国外贸发展的未来空间

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要素资源的丰裕性继而要素价格的高低是贸易分工的基础。但现实经济中，规模经济、技术条件等也是影响贸易分工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单就劳动力成本而言，也必须综合考虑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生产率两个因素。也就是说，对劳动力成本以及贸易竞争力的判断，除去劳动力价格因素以外，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在此，我们引入单位劳动成本的概念，以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及相对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具体的计算公式如式（1）。

$$ULC = \frac{W}{VA/L} \quad (1)$$

其中， ULC (labor cost per unit of output) 指的是单位产出劳动成本，其是行业平均工资 W 和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VA/L 的比值。 VA 代表的是行业的产出增加值， L 则代表行业的就业数量。利用式（1），我们首先对 1978-2009 年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进行了测算，结果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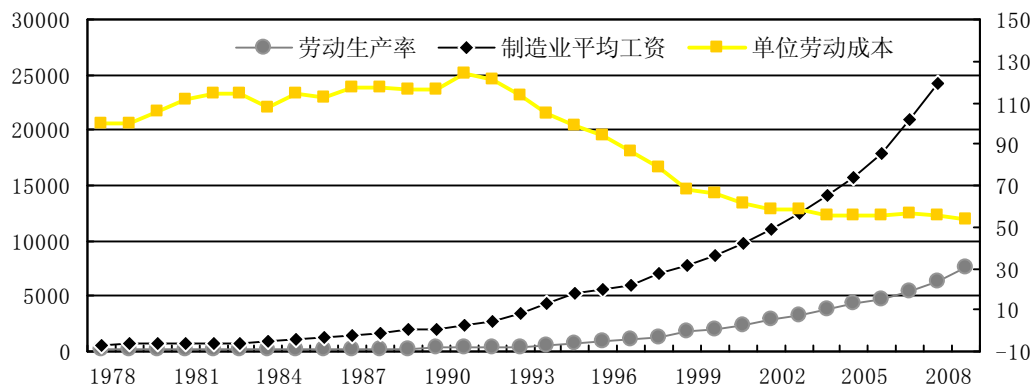


图 5 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及组成（1978-2009）²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

从图 5 可以看出，在 1978-2009 年期间，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呈现出两个阶段的不同走势。在 1991 年之前，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呈现出逐渐增加的态势。究其缘由，则在于制造业平均工资的上升速度要快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在 1978-1991 年期间，我国的制造业平均工资上升了 2.8 倍，而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还不到 2 倍，反应在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上便是持续上升趋势的出现。而与之相对应，在 1991 年之后，伴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展开，制造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开始迅速提高，由 1991 年的 280（1978 年为 100）增加到了 2009 年的 7567，提高了 26 倍，远远快于平均工资 14.7% 的年平均增长率。相应地，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也呈逐渐下降之势，我国 2009 年的单位劳动成本只相当于 1978 年的 54%。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在我国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平均工资的上涨并未直接导致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加。

由于开放背景下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并不来源于本国劳动力成本的绝对大小，而是取决于不同国家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差异。因此，接下来，我们对中国与世界几个主要国家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大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跨国比较（1980-2007，中国=100）

	美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巴西	印度尼西亚	印度
1980	447	434	310	181	—	130	312
1990	363	378	281	153	116	72	215
1995	454	546	395	173	155	148	230
1996	492	596	428	194	236	140	258
1997	529	633	468	199	251	—	292
1998	620	725	552	198	293	169	245
1999	644	753	563	201	254	163	247
2000	726	824	598	236	256	169	302
2001	770	866	661	262	262	259	313
2002	759	866	655	268	249	191	290
2003	798	891	650	285	256	228	277
2004	778	871	640	268	254	184	247
2005	745	838	617	276	264	181	—
2006	735	797	616	276	—	—	—
2007	750	796	—	—	—	—	—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UNIDO 和 OECD STAN 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² 图中左轴对应的是劳动生产率和制造业平均工资，右轴对应的是单位劳动成本，单位劳动成本和劳动生产率均选择 1978 年作为基期，工资的单位为元。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 1980-2007 年期间，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点，相对于发达国家表现的尤为明显。在 1980 年，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分别是中国的 4.5、4.3 和 4.1 倍，在 1990 年，受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较快的影响，这一比重分别下降到了 3.6、3.8 和 2.8 倍。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相比于中国，主要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到 2006 年，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尚不足美国、德国和日本平均单位劳动成本的 1/7。而同几个主要的贸易竞争对手相比，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优势也是非常的显著。整体上看，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相对韩国、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劳动成本优势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平均尚不足这些国家的二分之一。在 2001 年之后，虽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相对于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有所下降，但降幅不大，当前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仍在中国的两倍左右。因此，从相对层面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还将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得以保持。

（四）劳动力成本的区域差异为产业的国内梯度转移提供了动力条件

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在开放的视角下对劳动力成本的跨国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从结论上看，鉴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现有优势，在中短期内，虽然会存在个别产业小规模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外转移的可能，但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制造业大国地位不会有所根本改变。接下来，我们将分析的视角转向区域内部，在地区层面上探讨我国未来外贸发展的现实基础。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视角，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虽然从中短期看，我国的外贸发展仍然具有劳动力的现实成本优势，但在长期来看，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供给敞口的消失将不可避免，终究会面临产业的对外转移还是对内转移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地区层面上对我国区域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也是我国调整产业布局、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未来产业转移的可能途径看，在我国特别是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力需求缺口出现、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的条件下，产业转移的方向无外乎是向国外还是国内的转移调整。而从影响产业转移方向的因素看，虽然制度、基础设施条件、环境规制标准等都会对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形成影响，但在进行转移的产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前提约束下，劳动力成本的高低仍然是影响未来产业转移方向选择的核心条件。在这个角度上说，未来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关键仍然在于国内外劳动力成本的相对高低。而在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在的假定下，我国不同地区间劳动力报酬特别是单位劳动成本差异的存在便成为产业可能转向国内的基本前提。而从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区域比较看，这样一种劳动力成本的区域梯度差异是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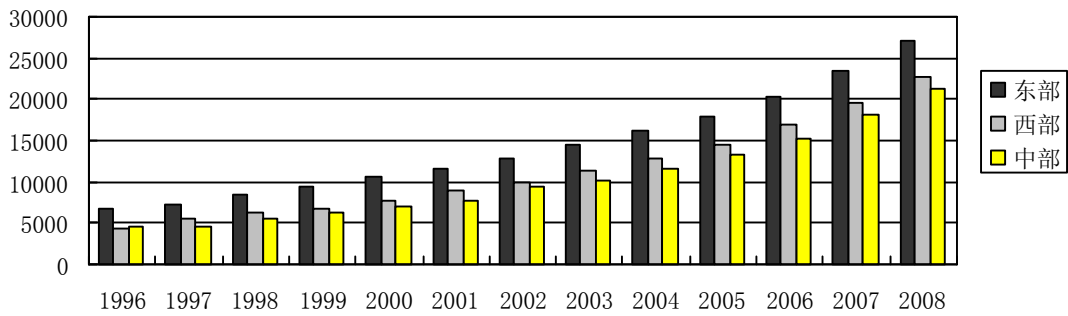


图 6 我国不同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工资 (1996-2008 年)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这一点在地区间劳动力工资的差异上反映的也较为明显。从图 6 可以看出，在 1996-2008 年期间，我国不同地区间，制造业部门的年平均工资呈现出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平均工资要显著高于我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平均而言，在 1996-2008 年期间，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平均工资比西部地区高出了 29.8%，而比中部地区高出了 40.8%。事实上，即便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从单位劳动成本的地区比较看，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从表 3 可以看出，在 2008 年，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特征非常明显。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和福建成为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省市，而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的省份则是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整体而言，以北京为基准省份，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为 54.41，而中部地区则只有 47.1。因此，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在未来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方向的选择上，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会是比较理想的移入地，而这必然会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地位的维护和巩固起到一定的强化左右。

表 3 我国不同省市、自治区的单位劳动成本比较 (2008 年 北京=100)

地区	省份	单位劳动成本	省份	单位劳动成本
东部	北 京	100.00	江 苏	32.63
	天 津	54.16	浙 江	53.23
	河 北	30.62	福 建	88.05
	辽 宁	43.69	山 东	33.50
	上 海	61.93	广 东	46.27
	平均		54.41	
中部	河 南	36.35	吉 林	47.41
	湖 北	53.33	黑 龙 江	65.47
	湖 南	50.71	安 徽	39.49
	山 西	41.76	江 西	42.39

	平均		47.11	
西部	四川	54.23	青海	49.20
	贵州	77.91	宁夏	52.54
	云南	71.97	新疆	41.58
	陕西	69.35	内蒙古	29.63
	甘肃	73.84	广西	58.61
	平均		57.89	

三、劳动力成本与贸易结构转换——来自跨国制造业行业的证据

在前一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发展空间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就整体而言，考虑到外部的需求基础、中国的贸易互补优势、劳动力成本的跨国差异以及我国区域内部产业梯度转移的可能性，在中短期内，我国的对外贸易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相应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地位也会继续加以巩固。这一点，是不会因为我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有所根本改变的。

但问题在于，虽然在整体和总量意义上来看，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会对我国制造业的贸易大国地位形成根本冲击，但在制造业内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仍然会对我国的产业结构继而贸易结构的变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具体来说，一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至少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一国某一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首先，从劳动力成本增加的直接影响来看，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直接增加了生产企业的显性成本，这必然会压缩企业生产的利润空间。在开放条件下的反映便是企业贸易竞争力以及相应外部市场份额的下降。其次，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动态影响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又会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对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意味着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福利的改善，这有助于劳动者提高自身的教育和培训投入，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增强企业的贸易竞争力。另一方面，在考虑不同产业间劳动力流动效应的情况下，某一行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有利于吸引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向高收入行业的跨行业流动，这在有利于提高工资上涨行业生产规模和企业竞争力的同时，却会对其他行业的发展形成不利影响。相应地，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

应该注意到的是，在不同产业间，由于具体产业的产业特征不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发展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效应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被加以放大或紧缩，而具体的相互作用结果则取决于产业的特有属性。最直观的例子，如果两个产业的劳动要素密集度不同，那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所带来的成本增加效应也必然会存在差异，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的影响无

疑会更为明显。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不必然会影响到特定产业的比较优势，不同产业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大小仍然取决于产业的内在属性。事实上，如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市场力量自发作用结果的话，其传递的其实是要素市场供求变动以及禀赋结构变动的价格信号。相应地，由此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生产和贸易结构的调整也是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外在体现。其改变的只是不同行业产出规模和贸易竞争力的力量对比，而不会对一国整体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动力形成根本冲击。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在市场力量自发作用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更多的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下面，我们将以几个假说的形式对劳动力成本上涨对贸易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

假说 1: 劳动力成本上涨有利于增加对外出口中技术水平较高产品的出口比重。

一国某一产业的技术水平不仅反映了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也反映了不同产业生产要素投入的构成差异。当劳动力成本上涨时，由于高技术水平产业在投入要素构成和生产率水平上的优势，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不但不会对这些产业的贸易竞争力构成影响，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一国出口中这些产业的出口比重。一方面，在那些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生产要素构成具有较为明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特征，劳动力要素投入在生产要素投入中所占的比重往往较低。因此，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相对较小。另一方面，由于在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产业的整体研发水平是产业发展的关键，而产业研发水平的高低则与产业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相应地，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也会要求劳动力报酬的较高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产业的高劳动力成本往往意味着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产业生产率。相应地，劳动力成本特别是中低端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也不会对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形成根本冲击。

假说 2: 劳动力成本上涨有利于增加对外出口中规模报酬递增特征较为明显产品的出口比重。

劳动力成本上涨对出口中规模报酬递增产品相对较大的促进效应可能与行业的规模经济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扩大效应有关。具体来说，假定某种因素使得某一产业的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出于对高收入回报的内在需求，劳动力会由劳动力成本较低产业向高工资产业

流动。而伴随着新的劳动力的流入，劳动成本上涨产业的生产规模自然会相应扩大。而此时，由于不同产业的规模报酬特征不同，生产规模的扩大程度也就存在着差异。在那些规模报酬特征较为明显的产业，其受要素投入增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无疑更为显著。相应地，其出口的增加也就更为明显。

假说 3: 劳动力成本上涨有利于增加对外出口中附加值较高产品的出口比重。

一国某一产业的出口附加值不仅关系到出口企业的盈利能力，更是一国整体福利水平提高的关键。而在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的背景下，那些高附加值行业的出口也将会有更大的上升空间。也就是说，在那些附加值较高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能更好的促进这些产业出口份额的增加。这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在那些盈利能力较高的产业，对于同等幅度的劳动力成本增加，相比于其营业利润，劳动力成本提高所带来的显性生产成本上升相对较小，其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也相应变小。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上文提到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产业生产规模扩大效应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对于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而言，同等程度的产业规模扩大可能会为其带来更多的营业利润，而这无疑会促进其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假说 4: 劳动力成本上涨将会减少对外出口中出口集中度较高产品的出口比重。

我们这里所说的出口集中度指的是出口国出口的某一产品在出口目标国从所有国家进口中所占的比重。我们认为，在那些出口集中度较高的产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对这些行业的出口规模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而这种抑制作用随着出口集中度水平的提高将会逐渐增加。究其缘由，这可能与进口国居民需求的消费价格弹性有关。在一般意义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最终反映在生产价格和出口价格的提高上。而伴随着出口价格的提高，进口国的进口需求必然会有所降低。但相比于那些进口份额较小的产品，在居民收入水平给定的前提约束下，那些进口份额较大的产品无疑具有更高的价格弹性。因此，进口国的需求水平继而相应产业的出口份额也自然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

(一) 劳动力成本对出口结构影响的计量分析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在前文所提出的这些假说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实证数据来对这些假说进行验证。进一步对劳动力成本影响贸易竞争力的机制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行业效应差异进行分析。

实际分析时，我们使用的模型形势如（2）式。

$$y_{i,k} = \sum_j \alpha_j \text{Country}_j + \sum_j \beta_j \text{Industry}_j + \delta_1 LC_{i,k} + \delta_2 LC_{i,k} \times \text{Inter}_{i,k} + \delta_3 \text{Share}_{i,k} + \delta_4 \text{Scale}_{i,k} + \varepsilon_{i,k} \quad (2)$$

其中， $y_{i,k}$ 表示的是在样本期间内第*i*个国家第*k*个产业的出口占商品总出口份额的平均值。 $\text{Country}_j, j=1, 2, 3, \dots, 63$ 代表的是不同国家的哑变量，而 $\text{Industry}_j, j=1, 2, 3, \dots, 27$ 则表示的是同一国家内部不同产业的哑变量。 LC 为劳动成本，实际分析时为了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考虑，我们仍然采用单位劳动成本这一指标，计算方法同（1）式，同时，考虑到行业劳动力流动的滞后性，我们采用的是样本区间初始的劳动力成本大小。 Share 表示的是不同产业的增加值占整个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 Scale 则是规模经济变量，以相应产业的增加值与企业个数的比值表示。 Inter 为状态依赖变量，我们以此来对不同特征的产业进行划分，其与劳动力成本的交叉项的形式则反映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不同产业的效应差异。实际分析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同时为了对我们的假说进行验证，我们选取了技术水平、产业规模、行业盈利能力、出口市场集中度四组指标。其中，技术水平参照 Marcato 和 Malfi（2005）对 OECD 国家制造业技术水平的分类标准，以产业的研发投入占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表示；产业规模的衡量与上文相同；不同行业的盈利能力以行业出口的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值表示。为了准确的对商品的价格进行衡量，我们采用 SITC 五位数的分类数据，对每种产品的价格进行计算后，采用价值加权的形式得出 SITC 两位数的产品价格，然后再按照 Keith(1989)所提出的转换办法将 SITC 数据转换成 ISIC 所对应的 27 个行业。³出口市场集中度则以一国某产业的出口额占世界总的出口额的比重来表示。

实证分析时的生产数据来源于 UNIDO 数据库，贸易数据则来源于 UNCOMTRADE 数据库，总样本数据涵盖 1990-2004 年 63 个国家 ISIC 第二版分类标准下的 27 个行业。实证分析的结果见表 4。

³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按照 ISIC 第二版的分类标准，不含 380 其他制造业行业。

表 4 实证分析结果

样本时间	1990-1994				1995-1999				2000-2004			
常数项	-4.87*** (0.83)	-6.12*** (0.87)	-5.15*** (0.82)	-7.28*** (0.73)	-5.62*** (0.82)	-5.93*** (0.84)	-5.03*** (0.81)	-6.57*** (0.67)	-4.65*** (0.72)	-4.71*** (0.72)	-4.46*** (0.72)	-5.79*** (0.63)
产业份额	0.70*** (0.05)	0.69*** (0.05)	0.72*** (0.05)	0.54*** (0.04)	0.62*** (0.05)	0.62*** (0.05)	0.64*** (0.05)	0.52*** (0.04)	0.64*** (0.04)	0.65*** (0.04)	0.65*** (0.04)	0.54*** (0.04)
产业规模	0.12** (0.06)	0.26*** (0.07)	0.21*** (0.06)	0.14*** (0.05)	0.09* (0.06)	0.13** (0.06)	0.05 (0.06)	0.04 (0.05)	0.01 (0.05)	0.04 (0.05)	0.01 (0.05)	-0.01 (0.04)
劳动成本	0.14 (0.13)	-0.44* (0.26)	0.03 (0.12)	-1.53*** (0.14)	0.08* (0.05)	-0.09 (0.11)	-0.30** (0.15)	-1.45*** (0.08)	0.03 (0.04)	-0.11 (0.10)	-0.27* (0.18)	-0.96*** (0.08)
劳动成本 ×技术水平	0.11* (0.07)				0.02 (0.02)				0.03* (0.02)			
劳动成本 ×产业规模		0.08*** (0.03)				0.03* (0.02)				0.03* (0.02)		
劳动成本 ×盈利能力			0.04*** (0.02)				0.06*** (0.02)				0.05* (0.03)	
劳动成本 ×出口集中度				-0.19*** (0.01)				-0.20*** (0.01)				-0.15*** (0.01)
R ²	0.69	0.69	0.71	0.76	0.71	0.70	0.72	0.80	0.78	0.78	0.78	0.83
观测值	956	975	907	958	974	958	943	964	782	782	756	777

说明：括号中数字为相应变量的标准差。*、**和***分别代表变量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从表 4 可以看出，在我们选择的三组样本区间内，产业份额和产业规模两个控制变量在符号和统计显著性都较为一致，经济学意义也较为明确，反映了我们模型分析的稳健性。同时注意到，就劳动成本变量而言，在不同的回归模型中，单位劳动成本的系数呈现出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系数的符号和数值大小上，也体现在变量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这说明，在不考虑行业特性差异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相应产业的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仍然具有不确定性。这样的一个分析结论也是与我们前文理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相基本一致的。

接下来我们重点对之前我们所提出的假说进行检验，主要是对劳动成本与状态变量的交叉项进行分析。整体而言，在不同的样本期间内，除去 1995-1999 年这一时期技术水平的交叉项变量在统计上不够显著以外，其余交叉项变量在统计上都非常显著，并且在不同的样本区间内，符号呈现出一致性。这说明劳动力成本对出口竞争优势的影响确实具有行业差异性，而在具有这些特征的产业内部，劳动力成本对出口竞争优势的影响也具有一致性。

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对单位劳动成本和技术水平变量的交叉项进行考察。我们发现，除去 1995-1999 年这一时期，交叉项系数的正值不够显著外，在其余两个样本时期，技术水平交叉项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大部分时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不同技术水平的行业间对出口优势的影响都存在着显著差异，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那些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出口增加也相对较快。其次，就产业规模和劳动力的交叉项而言，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交叉项的符号都为正，并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这说明在那些生产规模较大的行业，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不但对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种推动作用还随产业规模的扩大而有所增加。再次，我们就产业的盈利能力与劳动力的交叉项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同产业规模的交叉项变量相类似，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交叉项变量的符号都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产业盈利能力水平的高低的确显著影响了劳动力成本对出口竞争优势的促进效应大小。在那些盈利能力较高的产业，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能更好的促进这些产业出口份额的增加。最后，考察单位劳动成本与出口集中度交叉项变量的系数和统计显著性。我们发现，与前几个状态变量交叉项不同，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出口集中度交叉项变量的符号为负，并且在统计上非常的显著。这说明，在那些出口集中度较高的产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这些行业的出口规模扩大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而这种负面影响随着出口集中度水平的提高还有加大的趋势。

综上，在不同的产业间，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在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出口集中度较小的产业，劳

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对这些产业的贸易竞争力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提高这些产业在总的对外贸易出口中的比重。因此，伴随着一国出口集中地的均衡分布以及出口产品中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特征明显、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出口份额的增加，无论是就对外出口的地区结构还是产业结构而言，一国的贸易结构都呈现出优化升级的态势。因此，在积极的意义上来讲，一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虽然可能会对个别行业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但其却构成了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逻辑起点。但应该注意的是，从我们前文分析的理论逻辑来看，之所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为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可能，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在于不同地区 and 不同产业间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二是在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市场力量自然作用的结果。前者保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功能的顺利实施，而后者则避免了非市场因素所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显性生产成本增加的放大作用。相应地，这两点也构成了我国未来政府政策选择的基本切入点。

(二) 劳动力成本上涨与中国的贸易结构调整：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在上一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在大类层面上，就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不同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从而在总量层面上就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到个体产业层面，细致探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具体行业效应差异，以为劳动力成本上涨背景下我国未来贸易结构的调整提供更为具体的理论依据。实际分析时，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采用的模型形式如（3）式。

$$y_{j,t} = \sum_j \alpha_j \text{Country}_j + \delta_1 y_{j,t-1} + \delta_2 LC_{j,t} + \delta_3 \text{Share}_{j,t} + \delta_4 \text{Scale}_{j,t} + \varepsilon_{i,k} \quad (3)$$

其中， $y_{j,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的是某一产业第 j 个国家第 t 年的贸易竞争力。实际分析时，我们考虑了三种不同的指标，分别是：出口占商品总出口份额的比值，净出口率和 Michazely 指数。⁴ $\text{Country}_j, j=1, 2, 3, \dots, 63$ 代表的仍是不同国家的哑变量， LC 为劳动成本，实际分析时为了对上文的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在此以职工工资来衡量。同时，在考虑滞后效应存在的情况下，我们采用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一期和二期滞后值。而 Share 和 Scale 的定义则与上文相同。我们仍然考虑了制造业 ISIC 三位数分类下的 27 个行业，包含了 63 个国家 1980-2004 年的面板数据，实际分析时，各变量均以五年平均的形式进入回归方程。所有数据的来源与上文相同。表 5 列出了使用不同指标来衡量贸易竞争力时模型（3）的回

⁴ 净出口率和 Michazely 指数的计算公式分别是：净出口率 = (行业出口 - 行业进口) / (行业出口 + 行业进口)，Michazely = (行业出口 / 总出口) - (行业进口 / 总进口)。

归结果。⁵同时,为了对中国现有贸易优势行业进行判断,更重要的是对劳动力成本提高背景下,中国现有制造业行业的贸易竞争力和未来发展前景进行判断分析,我们也在表5中给出了2009年中国以三种指标衡量的贸易竞争力的大小。

表5 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

行业代码及名称	出口份额	净出口率指数	Michaely 指数	中国的出口份额(%)	中国的净出口率指数	中国的Michaely指数(%)	
劳动	311 食品制造业	-0.21	-0.06	-0.009	1.64	-0.07	-0.62
力成	314 烟草加工业	-0.15	-0.05 ^a	0.001	0.04	0.02	-0.01
本效	321 纺织业	-0.03	-0.005	-0.01	5.98	0.60	4.20
应为	322 服装业	-0.29	-0.08	-0.012	8.04	0.97	7.88
负的	324 制鞋业	-0.13	-0.05	-0.005	2.26	0.89	2.11
行业	331 木材行业	-0.13 ^a	-0.02 ^a	-0.002	0.58	0.12	0.04
	332 家具业	-0.14 ^a	-0.05	-0.001	2.02	0.92	1.91
	361 陶瓷制品业	-0.21	-0.09	-0.0003	0.26	0.57	0.18
	351 工业化学品行业	0.11	0.03	0.004	3.29	-0.30	-3.97
	352 其他化学品行业	0.12	0.05	0.01 ^a	1.22	0.07	-0.04
劳动	353 石油加工业	0.15	0.08	0.006	0.67	-0.75	-4.84
力成	354 石油及煤制品杂项	0.54	0.15	0.002	0.23	-0.72	-1.45
本效	355 橡胶制品业	0.23	0.03	0.0002 ^a	0.77	0.14	0.07
应为	369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0.05	0.001	0.70	0.50	0.42
正的	381 金属制品业	0.26	0.02	0.001	3.01	0.42	1.53
行业	382 机械制造业(除电器)	0.42	0.10	0.02	20.59	0.29	6.92
	383 电器制造业	0.38	0.03	0.006	22.28	0.12	1.57
	384 交通设备制造业	0.16 ^a	0.02	0.004	6.71	0.17	1.01
	385 专业及科学设备制造业	—	0.07	0.004	2.90	-0.25	-2.89
劳动	313 饮料行业	—	—	—	0.06	-0.19	-0.05
力成	323 皮革业	-0.15	0.12	0.004	1.12	0.62	0.81
本效	341 造纸业	—	—	—	0.68	-0.30	-0.82
应不	342 印刷出版业	-0.11	0.03	—	1.84	0.65	1.37
显著	356 塑料制品业	-0.15	0.03	—	1.19	-0.25	-1.16
的行	362 玻璃制品业	-0.20	0.03	—	0.94	0.55	0.61
业	371 钢铁制品业	—	0.09	—	2.47	0.05	-0.22
	372 有色金属业	—	0.08	—	1.31	-0.40	-2.36

注:表格中的第3,4和5列分别代表采用出口份额、净出口率指数和Michaely指数作被解释变量时,劳动力成本的系数。—代表系数不显著,a则代表劳动力成本的一期滞后项不显著情况下采用的二期滞后项系数。后三列分别为2009年中国各产业的相应贸易竞争力指标的数值大小。

从表5可以看出,对于每个具体的行业而言,劳动力的成本效应在不同的行业存在着显

⁵ 限于篇幅,我们只给出了劳动成本的系数大小,具体的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著的差异。

劳动力成本效应为负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食品制造业、纺织业、服装业、制鞋业和家具业等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出口份额为例，这些行业劳动力成本的系数大多在-0.1和-0.2左右，说明一个百分点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会导致这些行业0.1到0.2个百分点的出口份额下降。这说明，从国际经验来看，伴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逐渐上升，我国这些产业的发展将遇到较大的挑战。同时，需要提及的是，这些行业也是现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具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的行业，这一点，在纺织业和服装业制造业上表现的尤为明显。相对于其他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两个产业不但在当前我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当前的贸易竞争优势也比较明显。纺织业和服装业在2009年我国对外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5.98%和8.04%，净出口指数和Michaely指数的值也相对较高。因此，相对于其他劳动力成本负效应的行业而言，劳动力成本上涨对这两个行业的冲击可能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相对较大的影响。而如何在劳动力成本上涨背景下维护这些行业的贸易竞争力也是我国未来贸易和产业政策制订中所应着重考虑的问题。

劳动力成本效应为正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学品行业、金属制品业等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中技术水平行业，以及机械制造业、电器制造业等高技术水平含量的制造业。这一点，也是与我们前文分析的结论相一致的。即由于这些行业的行业特性优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但不会制约这些产业的发展，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这些产业贸易竞争力的提高。而具体到我国而言，由于机械制造业、电器制造业在我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这两个产业在出口中的份额之和几乎接近我国对外出口的50%，因此，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不但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出口产品技术构成，对我国整体出口规模的扩大也具有促进作用。但需要提及的是，相对于机械制造业、电器制造业，交通设备制造业和专业及科学设备制造业所蕴含的技术水平更高，但出口份额却相对较小。因此，如何在劳动力成本上涨背景下合理推动这两个行业出口份额的增加也应构成我国未来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最后，劳动力成本效应不显著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皮革业、印刷出版业和钢铁制品业等制造业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最高的钢铁制品业在我国总出口中的比重也不过2.47%，其余行业更是在2%以下。因此，即便劳动力成本上涨会对这些行业的贸易竞争力产生影响，其对中国整体出口的影响也几乎微乎其微。

接下来，我们在对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我国出口的产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劳动力成本上涨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调整。表6计算出了2009年我国每一行业对国外出口占全部行业对相应国外市场总出口额的比重。

表 6 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我国出口地区结构的影响

行业代码及名称		美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日本	印度	韩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俄罗斯
劳动力成本效应为负的行业	311 食品制造业	3.86	4.18	4.56	9.44	2.34	5.91	6.59	4.06	5.30	4.96	7.54
	321 纺织业	3.86	4.18	4.56	9.44	2.34	5.91	6.59	4.06	5.30	4.96	7.54
	322 服装业	8.13	11.2	14.5	14.1	6.00	16.1	0.21	3.83	12.9	9.97	15.7
	324 制鞋业	3.98	1.97	2.6	1.87	1.36	2.00	0.36	0.64	2.96	1.95	6.26
	332 家具业	3.76	1.98	2.86	1.77	1.57	2.07	0.51	0.77	5.03	4.34	1.14
	总计	23.6	23.5	29.1	36.6	13.6	32.0	14.3	13.4	31.5	26.2	38.2
劳动力成本效应为正的产业	351 工业化学品行业	2.03	2.66	1.47	3.54	3.15	3.49	11.2	5.43	1.97	3.75	3.18
	352 其他化学品行业	1.09	1.90	1.86	1.60	1.11	1.02	3.65	1.08	0.85	1.12	1.05
	381 金属制品业	3.25	3.38	3.04	3.65	2.74	2.18	4.14	3.11	4.63	4.24	4.34
	382 机械制造业（除电器）	25.5	23.7	26.8	15.9	38.7	17.0	22.4	15.4	18.2	18.8	14.1
	383 电器制造业	20.4	20.7	18.8	16.9	20.0	17.6	25.9	28.5	15.4	18.2	14.1
	384 交通设备制造业	4.71	8.66	5.94	9.12	4.96	4.93	7.10	4.90	7.20	6.39	3.44
	385 专业及科学设备制造业	2.04	2.66	1.22	1.63	1.14	2.27	2.17	3.29	1.02	1.00	1.81
总计	59.0	63.7	59.1	52.3	71.8	48.5	76.6	61.7	49.3	53.5	42.0	

注：单元格中的数字表示的是中国对外出口中某一行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单位为%。同时，由于表 6 中所分析的国家在行业 331,361,353,354,355,369 中的出口份额较小，大部分数值都不足 1%，所以我们实际分析时不再对这些行业加以考虑。

从表 6 可以看出，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背景下，不但我国出口的产业结构面临调整，地区结构也将会呈现出相应的变化。

首先考察那些劳动力效应为负的行业。在这些行业中，由于食品制造业、制鞋业和家具制造业在我国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这些行业出口的地区结构变动不会对我国对外出口的地区结构产生较大影响。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我国出口地区结构的变动主要体现在纺织业和服装业。具体来说，对于纺织业而言，由于在对外出口中，纺织业在对意大利、印度和俄罗斯的出口比重较高，因此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国纺织业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将下降较多，相应地就纺织业而言，这些国家在我国出口市场中的地位将有所下降。相似的道理，对于服装业而言，受劳动力成本上涨影响较大的出口地区主要集中在欧洲地区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以及日本、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也不利于我国服装业对这些国家出口贸易的展开。

其次考察那些劳动力效应为正的产业，重点是考察在我国出口市场中份额较大的机械制造业、电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就机械制造业而言，由于美国、德国、法国和

荷兰对我国制造业产品的进口较为集中，因此，伴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我国对美国 and 欧洲地区的机械制造业产品出口有望进一步增加。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电器制造业领域，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背景下，美国、德国、法国和韩国在我国电器设备制造业出口中的地位将会进一步得到巩固。而对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而言，由于这一产业的产品在对德国市场的出口中相对更为集中，因此可以预计，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将会推动我国对德国出口数量的增加。

最后，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东亚地区的印度。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是被视为中国的竞争对手而存在的。但在未来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背景下，我国对印度的出口规模有望进一步增加。一方面，那些劳动力成本效应为负的行业，在我国对印度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全部行业的累积也只有 14.3%，排在所分析国家的倒数第二位。而另一方面，在那些劳动力成本效应为正的产业，在我国对印度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却相对较高，全部行业的累积高达 76.6%，排在所有国家的第一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印度可能是下一个我国潜在的重要出口市场。

四、结论

本文尝试就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的未来发展空间和结构转换进行分析，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个别行业的出口产生影响，但从出口的外部需求基础、贸易互补性优势、单位劳动成本的国际比较以及我国内部劳动力成本的区域差异来看，其不会从根本上限制我国未来对外贸易特别是制成品贸易的发展空间。

2. 虽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会根本动摇我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但从国际经验来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仍然会对制造业的出口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地，如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完全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的话，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有利于促进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出口集中度较小的产业在总的对外贸易出口中比重的提高，而从这一点上说，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可能会成为一国贸易结构调整的起点。

3. 从具体的行业看，伴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服装业和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而这些产业对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的出口所受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也为未来我国出口中机械设备制造业、电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中国技术水平行业的出口拓宽了发展空间，有利于增强

这些行业的出口竞争力，而美国和欧洲地区的德国、法国仍将是这些行业的主要出口国。

4. 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背景下，我国的未来政策取向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侧重：一是强调市场机制的完善，在建立完善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机制的同时，减少对劳动力价格的行政干预，特别是不可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名，一味追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从而放大非市场因素所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二是有步骤、有规划的合理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特别是以服装业和纺织业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地区内的产业转移，最大可能的降低劳动力成本上涨对这些产业发展的不利影响。但在推动我国“腾笼换鸟”式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决策当局仍需慎重而行，尽量减少不适当的引导和干预，避免出现笼空鸟未来的窘境。三是在我国未来出口地区的选择中，美国和欧洲市场仍是需要重点加以巩固和维护的区域，这一点对高端制造业行业可能意义更为重要。同时，考虑到我国对印度的出口潜力，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印经贸关系，对于我国的出口大国地位维护和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实现也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Garnaut, Ross and Yiping Huang, 2006,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oss Carnaut and Liang Song,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Giancarlo, Marcato and Lucio Malfi, 2005, *Testing the OECD Classific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Based on Technology*. Mimeo.

Maskus, Keith E., 1989, *Compa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Data and Product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Data for the Analysis of Trade Models*, pp.42, in: Hooper and 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ransactions*, Vol 5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蔡昉：“劳动力成本提高条件下如何保持竞争力”，《开放导报》2007年第2期。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蔡昉：“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和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和刘易斯转折点国际研讨会工作论文》，北京，2010年。

姚洋，余森杰：“劳动力、人口和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金融研究》2009年第9期。

于津平：“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间的比较优势与贸易互补性”，《世界经济》2003年第5期。

章艳红：“中国出口增长的外部需求基础：基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分析”，《开放经济评论》
2009年第4期。